

鞏固社會主義陣營之團結」，鞏固與法、義、印度、印尼左傾工會之聯繫，與亞、非、拉丁美洲各國自由工會關係之建立，均為其具體說明。而本年十二月將在莫斯科召開世界工會聯合會，係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巴黎成立，但自一九四九年美、英等國退出而另行成立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後，國際工會組織即分為兩大派：一為蘇俄控制之世界工聯（即世界工會聯合會），一為美、英所領導之自由工聯（即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據一九五八年「世界知識」年鑑統計，世界工聯會員之人數為一億零五百萬人，設有十一個產業工會國際，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為其團體會員，阿拉伯工會國際聯合會為接近世界工聯之組織。而自由工聯則有一百三十三個會員組織、分

佈在九十四個國家和地區，會員人數為五千五百萬，在歐洲、亞洲和美洲設有三個區域組織。此外自由世界尚有二十個舊的國際職業組織，統稱為國際職業書記處。蘇俄本年十二月之所以要召開世界工聯大會，其目的在打擊自由工聯與國際職業書記處之工運活動，爭取國際工運領導權，在國際工人羣衆中，展開「反帝、反殖民主義，爭取全面與澈底裁軍，爭取和平與和平共存」運動，為蘇俄赤化世界鋪路。

從以上分析，可以瞭解世界工聯是蘇俄對外統戰與赤化世界工具之一，而蘇俄職工會則為對外進行統戰對內壓榨職工、奴役職工之工具。所以這兩個組織，都不是一般的普通職工團體。

一九二一年蘇俄饑荒之研究

壹 災情

一九二一年春，蘇俄內戰方歇，伏爾加河流域、烏克蘭、克里米亞及烏拉爾等地共三十四省發生嚴重饑荒，災黎達四千萬人（災區如附圖一）糧價直線上昇，麪包漲十一倍半之多。莫斯科、彼得格勒、伊萬諾夫——沃涅什斯克等所謂「工業支柱城市」因配糧額減少，工人及居民多淪為餓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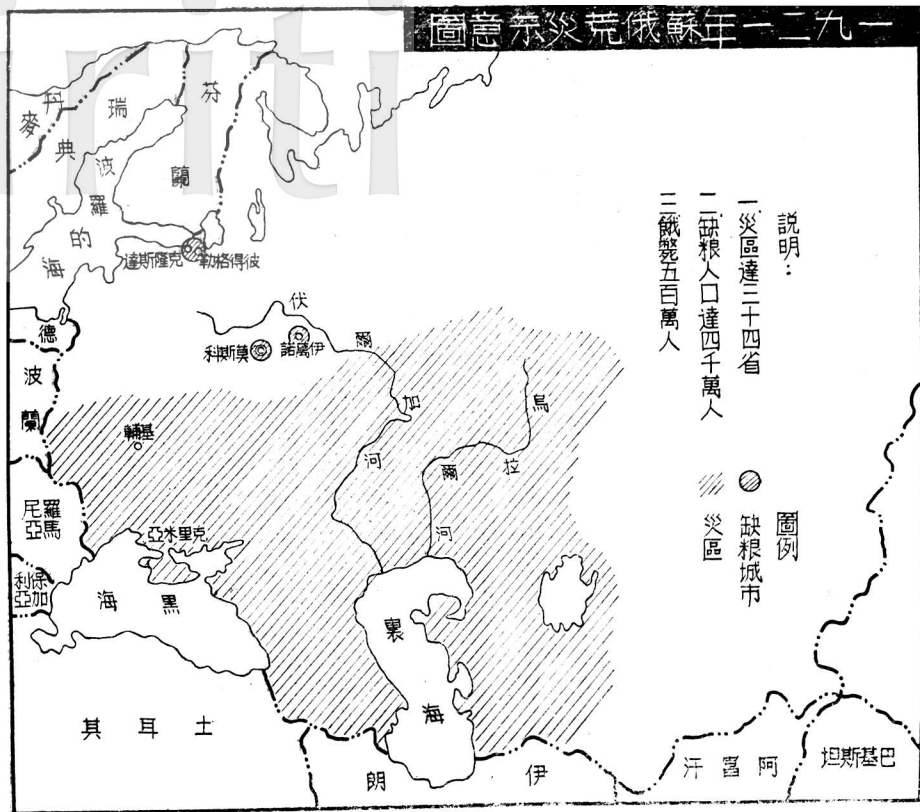
瘟疫與饑餓俱來，傷寒、斑疹傷寒、痢疾及其他時疫到處流行。

據最保守估計，死於饑餓與疫病者，約五百萬人。

災荒直接危及工商業。農產工業原料歉收，使工業減產，商品奇缺；工人迫於饑餓，紛紛流入農村覓食，更使大部份工廠關閉，生產停頓。

經濟破產促成社會與政治不安。共黨所炫耀之「工農軍事政治聯盟」因之解體；「無產階級專政」之社會基礎亦呈動搖。伏爾加河及頓河流域、烏克蘭、中亞細亞、西伯利亞、彼得格勒等地，相繼發生反共革命（反共革命情況如附圖二），尤以彼得格勒及克隆斯達之反共起義最震人聽聞，被譽為俄國「第三次革命」。上述革

一九二一年蘇俄荒災示意圖



命雖被俄共以武力救平，但對俄共本身與世界反共事業，均具有深遠教育意義。

一九二一年蘇俄饑荒之研究

貳 造 因

俄共黨史將饑荒造因諉之於：蘇俄經濟落後，特別是農業、及整個國民經濟遭受武裝干涉者和白衛軍破壞、旱災和帝俄政治窳敗之遺禍等。但西方學者認為「軍事共產主義」制度是災荒之主因。茲將各方意見綜合如次：

一、糧食減產：按蘇俄官方公佈資料，一九二〇年全國農作物總產量，僅達戰前百分之四十九；其中穀物總產量祇達一九一三年百分之四十六；工業作物產量下降，尤為顯著，如一九二〇年大麻收穫量只抵戰前百分之十，棉花百分之十一，甜菜百分之十五，亞麻百分之二十五。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G·威爾拿特斯基對一九二一年前蘇俄穀物生產曾作比較，指出一九一三年俄國穀物總產量為八千萬噸，一九一六年為七千四百萬噸，一九一九年為三千萬噸。一九一九年蘇俄總人口約一億三千七百萬，每人平均年得糧食二百二十公斤，已接近饑餓邊緣。一九二〇年穀物收穫量繼續下降，一九二一年復逢旱災，饑荒殆不可免。

前述資料顯示蘇俄穀物生產係俄共執政後始急劇下降，所謂帝俄遺禍，自屬誣賴之詞。至自然災害對糧食減產雖不無影響，但最主要者，乃為播種面積減少（按一九二〇年全國播種總面積僅為一九一三年百分之七十一。一九一三年為一〇、五〇〇萬公頃，內穀物播種面積九四四〇萬公頃）。其他如肥料及農具缺乏，影響亦大。播種面積減少原因，由於農民不滿餘糧收集制度，更不滿收集餘糧之「工人征糧隊」（彼等不僅掠奪餘糧，即農民依法保留之口糧亦一併搜括，使農民無以為食），而消極怠工。此外，精壯青年被迫參軍，農村勞力不足，亦為播種面積減少原因之一。

二、供應失調：供應失調之原因有二：一為有糧運不到，鐵路遭戰爭破壞，車廂、機車殘破（一九一九年秋，全俄鐵路機車損壞達百分之六十），加之鐵路員工被迫參軍，或迫於飢餓流入農村就食，致運輸困難。同時部份產糧地區發生變亂，致糧源中斷。二為有糧不肯賣，蘇俄人民基於下列原因，隱藏餘糧，不肯出售：通貨膨脹，對紙幣失去信心；限於法令不能自由買賣；賣掉餘糧後，很難獲得所需之日用品。按一九二〇年工業產值比戰前減少百分之六十。冶金業處於極端困難狀態，一九二〇年產生鐵十一萬六千噸，僅抵戰前百分之三十。煤比戰前減少三分之二。石油減產五分之三。棉織品更低，較戰前減少二十分之十九，每人僅得棉布一尺。

三、制度不良：糧食歉收，供應失調，事態有別，但原因則一。質言之，即「軍事共產主義」制度之罪惡。列寧曾坦率指出，以「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獲得之經驗，解決平時經濟任務，乃共黨政權之一大錯誤。「軍事共產主義」制度使上層制訂之經濟計劃與下層脫節，阻礙生產力之提高。

知名之無政府主義者亞歷山大·巴克曼認為，蘇俄一九二一年之危機，係共黨政府中央集權、官僚主義及對工農羣衆壓迫之後果。此點，歷史學者涅彼索夫曾予證實。他在所著「蘇維埃制度在北部土爾克曼的勝利」中，指明一九二一年該地遭遇之政治與經濟危機，係共黨政府無盡止錯誤與壓制人民羣衆主動性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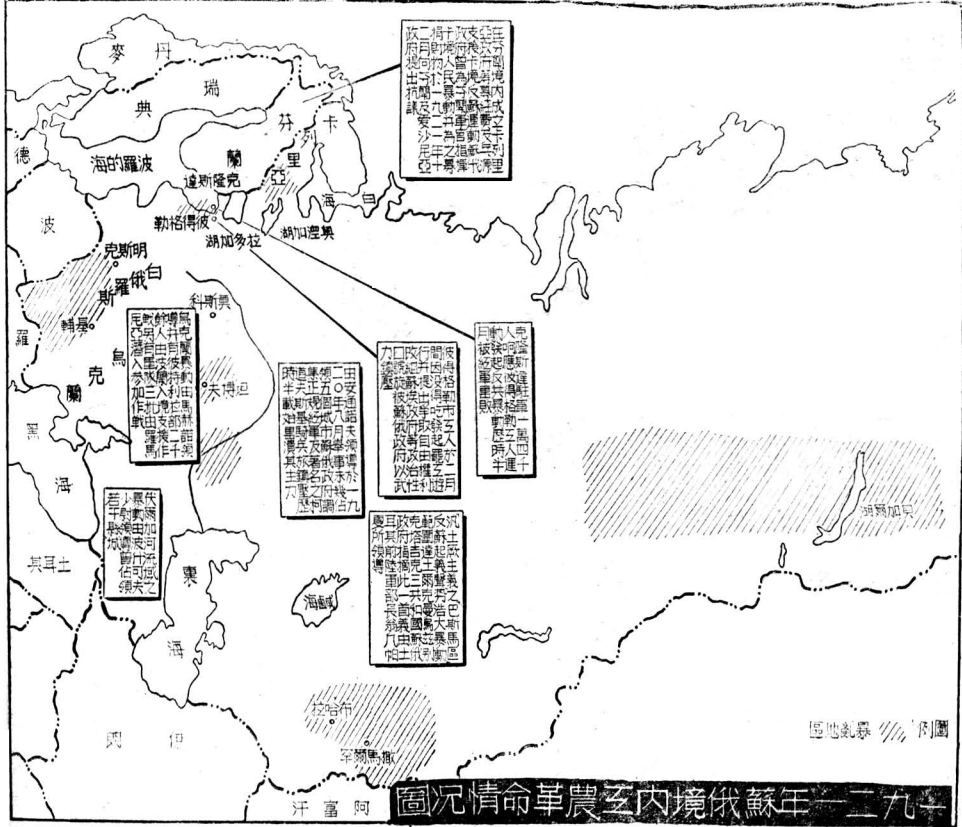
總之，這次饑荒是「人為災難」，是以「軍事共產主義」為種因的惡性循環。

叁 渡災辦法

俄共政府為澈底消滅饑荒及其不幸後果，除展開管制、鎮壓及

賑濟等治標辦法外，并對政治、經濟及黨務作根本改革，且置重點於後者。

圖二：



列寧曾說：蘇俄政府因劇烈之國內戰爭而忽略國家建設，致在經濟戰線上遭受慘敗。「新經濟政策」之實質，即作戰略退却，要趁還未被澈底擊敗之時，實行退却，以便重新安排，再度進攻。他又說，以蘇俄境況，必須後退，倘不如此，即無法恢復經濟生活及正常經濟關係，更不能恢復或發展工業，即無法擺脫危機。

茲將俄共政府採取之有關渡災措施分述於後：

一、加強管制鎮壓：

(一)嚴格控制糧食：繼續戰時配糧制度，嚴格控制食糧，用作控制人民，消滅異己之手段。配糧卡分四級，第四級配糧額僅相當第一級四分之一。第一級配糧卡規定配予「重體力勞動者」，但實際上祇有黨政首要及軍、警、特務始能享受。一般工農如無政治「污點」或成份不佳，可按其工作性質享受二三等配給。第四等發給無生產能力之「寄生蟲」「反革命份子」或地主階級。

(二)強化暴力鎮壓：一切罷工、怠工或武裝暴動，均視為反革命，以特務或軍隊予以澈底撲滅。對彼得格勒工人運動，克隆斯達、坦博夫等地之反共革命運動所採用之暴力措施便是例證，一如列寧所說：除用無情、迅速、飛快之鎮壓來對付外，沒有他法。因此俄共政府一再強化全俄肅反委員會職權，認它是「優點之繼續」，對付「階級敵人」最有效武器。

二、展開國內救災運動：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八日，蘇俄政府採取下列救災措施：

(一)組織中央賑災委員會，派加里寧任主席，并在各省縣市及工礦企業建設分支機構。(二)凡受災省份一律免除實物稅，並將政府存糧撥發受災省份，救濟災民，擴大春耕。(三)在「十飽養一餓」口號下，糧產豐收省份，負責救濟受災之各共和國和自治省(如伊萬諾夫——沃涅什斯克省和科斯特羅馬省救濟馬里自治省，莫斯科省救濟楚瓦什自治省，符拉基米爾省和彼得

格勒省救濟韃靼自治共和國，彼得格勒、庫爾斯克和斯摩稜斯克三省救濟巴什基里亞自治省)。各工廠、製造廠、政府機構及職工會均按月捐助救災現金或糧食。(四)沒收宗教寺院財產，向國外購糧濟荒。

三、接受外國援助：

(一)共產國際成立「國際工人援助委員會」，發動「全世界無產階級」募捐物資現金救濟俄災。

(二)世界各國基於人道立場，對俄荒災不忍坐視。美國成立「救濟蘇俄荒災管理署」(A. R. A)由胡佛主持。在法國建議下，歐洲亦成立「國際援俄委員會」。該會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在巴黎集會，選出法國駐俄大使努命斯為主席，并向俄建議在下列條件下接受該會援助：①不把饑民差別看待；②救濟機構有權分配救濟品，使合於平等原則；③持該會全權證書之專家代表團，可前往災區，實地考察。此外，一九二一年十月布魯賽爾會議，亦曾討論救濟蘇俄災荒問題，惟咸認蘇俄政府必須承認沙皇舊債為救災條件。儘管蘇俄政府對以上各國救濟措施，曾嚴加斥責，并指控在各國之援俄組織內，潛有泊洛谷布維區、可斯谷夫及克區金份子，進行反革命活動，但因其本身力量不足以解救嚴重之饑荒，不得不承認舊債，接受外援，同時要求西方國家結束威脅蘇俄安全之各種活動，并保證不侵犯蘇俄領土及主權，各國亦接受。據列寧在全俄第九次代表大會報告，蘇俄所獲外援，計歐洲方面：物資二百五十萬普特，現金六十萬金盧布；美洲方面：美國政府贈予相當三千萬美元之糧食及種籽。

四、爭取和平安定：蘇俄政府乘世界經濟不景氣中，利用列強間之矛盾，以和平姿態發動外交攻勢，俾打開各國之封鎖，爭取國際貿易，維持與各國之友好關係，斬斷國內反共革命運動之外援，

以便集中力量，渡過危局。一九二一年二月至十二月，先後與伊朗、阿富汗、波蘭、土耳其、英國、德國、義大利、挪威、奧國、瑞典和捷克等國簽訂協定。此種外交成就對蘇俄渡過災難，幫助甚大。列寧在全俄九次代表大會中說：在貿易方面，蘇俄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三年中總進口量爲一七〇〇萬普特，出口量爲二五〇萬普特。但自與各國簽訂協定後，僅一九二一年一年，進口即達五〇〇萬普特，出口量一一五〇萬普特。在一九二一年進口貨物內，有蘇俄急需之交通及工業設備（革命後第一次獲得外國火車頭及油槽車，使蘇俄之鐵路運程由一九二〇年每晝夜八十萬俄里提高到一百萬俄里）。他說這些數字雖然微乎其微，但畢竟在逐漸增長，并幫助蘇俄恢復國家經濟。在國家安全方面，蘇俄在一年內沒有遭受到大規模侵犯。列寧說：「我們在第一年獲得雖然極不充分，但究竟是其種程度的喘息機會，能够多多少少用一點力量來解決我們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務，即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醫治剝削階級使俄國遭受的創傷，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

五、實行大膽退却：如前所述，「軍事共產主義」制度爲蘇俄政治與經濟危機之主因，因之，俄共即由「軍事共產主義」制度實行大膽退却。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在克羅斯達砲火聲中，俄共在莫斯科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對俄共統一問題、工會問題、民族問題及工、農業問題進行討論，并通過決議，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之要點如左：

(一) 農業方面：廢除俄共第九次代表大會有關合作制度之決議。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實物稅稅率比餘糧收集制規定者減半。免征貧農某些實物稅，在特殊情況下，并可全部免收。在地方經濟範圍內，准許農民自由買賣剩餘農產品。農民并可穩定使用土地，九年之內，不再重分土地。

(二) 工業方面：將國有工業大企業聯合組成托辣斯，并實行經濟核算制度。對小型或利益較小企業租給合作社或私人經營，并准許私人開設小型企業，但傭工不得超過二十人。爲配合工業發展，加強工農聯盟，改善工人待遇，除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建立休假制度外，撥金盧布一千萬元提高工資。對工人工資廢除「平均主義」，改爲按件計酬，在工資外，另訂獎勵辦法。爲便於工人交換食物，把工人生產成品發給工人一部。此外，爲防止消極怠工，特制頒法律，嚴懲怠工。

(三) 運輸方面：除向國外採購設備，并實行經濟核算，確立貨運費率外，任命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仁斯基爲交通人民委員，一面動員參軍及逃亡之運輸人員重回崗位，一面對工作不力或有反革命傾向之運輸人員大力整肅。

(四) 民族問題方面：適應各民族願望，在符合各民族特性前提下，發展并鞏固「蘇維埃國家」。地方行政機構、法院、經濟機構及其他政府機關，應由當地人士組成。其人選以確實瞭解地方人民心理及生活者爲條件。上述機關須使用本民族語文。爲加強各民族自治能力，積極發展各民族本位文化教育，并加強培植民族幹部。同時制訂特別法律，發展各民族工業。爲維護蘇維埃國家之統一團結，建立若干自治共和國、自治省，以聯盟條約使各民族軍事、政治與經濟結爲一體，同時并對大國沙文主義及地方民族主義進行堅決鬥爭。

(五) 黨務方面：解散黨內一切派系，賦予黨中央整肅違犯黨紀之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之權力，選派最優秀黨員到工廠黨部工作，積極爭取工人入黨，以發展并鞏固基層力量。爲求組織嚴密與純潔，嚴格規定非無產階級份子不得入黨，并成立監察委員會，實行清黨，對腐化惡化及黨性不強者（約百分之二十五）一律開除黨籍。

。為增進黨之活力及黨員積極性，建立「黨內民主制度」，自上而下之領導機構一律由選舉產生。各級領導機構應作工作報告，并應逐級進行監督。在黨內建立自由討論與黨內批評制度，并集體制定全黨性決議。

(六)工會方面：將工會當作「共黨學校」對工人進行教育，并組織經濟，恢復生產。對國家重要經濟部門之組成，應由各產業工會或工會聯合會提出候選人。同時加強共黨對工會之領導，係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用說服方法為其領導原則。并加重工會責任，使之確實照顧工人生活與利益，以便確實掌握工人。

「新經濟政策」之實行，獲得顯著效果，俄共黨史稱：「黨採取的措施收到了成效。新經濟政策對國家的經濟日起良好的影響。勞動農民衷心歡迎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法令，并在一九二一年春擴大耕作面積。他們積極支援紅軍平定國內農民暴動和政治性匪患。工人情況亦獲得改善，脫離本階級現象中止，熟練工人亦重返工廠，於是大工業開始活躍，國家經濟亦逐漸擺脫破壞狀態。：黨和政府採取同荒災鬥爭之非常措施，雖然困難重重，但終於戰勝這場特大的災荒。」

西方歷史學者梁山(Dr. Walter C. Lohgan)及伏爾格·萬·盧赫均同意上述看法。梁山在其「世界現代史」中說：「新經濟政策的確治好蘇俄主要經濟病症，農民播種面積到一九二二年已達一九一三年標準，雖然多數農民對名義上之土地國有，不甚滿意，但對交租稅後，可自由出賣農產品一點，却相當滿足。……在工業方面，共建具有自主權之托辣斯數百個。每一托辣斯都由自身組成之管理委員會支配，委員會直接向最高經濟會議負責。工人工資比率，由托辣斯與職工會協商訂定。工廠利潤之半交給政府，十分之一到七用於工人福利。到一九二六年，國營托辣斯佔蘇俄全部工業

百分之七十七，合作社佔百分之五，特許之外國人工業佔百分之三，私人工業佔百分之十五，工業產量已達戰前標準。……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最初幾年，私人商業也相當繁榮。」

肆 結 論

一、一九二一年蘇俄之災荒，為俄共橫征暴斂倒行逆施之惡果，幾使俄共及其政權自食惡果，趨於覆亡。倘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間之國內戰爭與國際干涉繼續進行，俄共及其政權絕無法逃脫覆亡之劫運。

二、俄共政權能渡過此次大難，有二大原因：(一)列寧把握現實，既能察微知著，勇於認錯，且能因勢利導，暫順民心，終使荏弱之蘇俄得以避凶趨吉渡過難關。列寧所持政策治標治本，有守，有攻，使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措施配合無間，密切協調。(二)西方國家由於自私、短視和姑息，既未把握此大好時機，加強封鎖政策，援助蘇俄內部革命，以將此乾枯待斃之莠苗連根拔除；反而予以外交承認，通商貿易和實際支援，致養虎為患。

三、以缺乏組織之羣衆對抗組織嚴密之暴力，雖民怨成河，暴怒掀天，亦難有功。尤其對擅長「組織」之兇暴共黨，設不建立羣衆組織，並以羣衆組織結合武力鬥爭，更難成功。在蘇俄荒災期中，工農反共鬥爭之失敗即由於此。

四、工、農羣衆之耐性甚強，雖在暴政蹂躪之下，如有一線生機，即不願冒險犯難，發動革命，倘有半點希望，仍願茹苦含辛，等待明朝。俄共因深體斯義，遂實施「新經濟政策」，使俄人放棄反抗，俯首聽命。